

# 当代官场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sup>①</sup>

## ——肖仁福《位置》人物形象分析

王 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 肖仁福长篇小说《位置》塑造了沈天涯这一作为政府核心部门里的核心角色的官场文人形象。与同类官场小说不同,对于最终从权利中心走向权力边缘的沈天涯,肖仁福既无褒扬亦无批判,而只是通过对机关零距离的写实,来呈现沈天涯式的精神困境,并以此表达自己对转型期官场体制的反思和对官场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 肖仁福;《位置》;官场知识分子;精神困境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1-0018-04

## The Spiritual Plight for the Contemporary Bureaucratic Intellectuals

###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Image in the Novel of Position by Xiao Renfu

WANG Lan

(School of A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rade and Languages, Guangzhou, 510420)

**Abstract:** The novel of Position by Xiao Renfu creates the image of Shen Tianya, who is an officialdom intellectual, plays a key role in a key official sector. Different from other officialdom novels, this novel just keeps his voice neither praise nor criticism towards the stained hero of Shen Tianya, who are walking from power center to power edge finally, and aims to display the spiritual plight characterized by Shen Tianya by a realistic portrayal of the governmental sectors. And from this unique point, Xiao Renfu voices his reflection on the Chinese officialdom system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and his humanistic concern over the officialdom intellectuals' living conditions.

**Key words:** Xiao Renfu; Position; Officialdom Intellectual; Spiritual Plight

在政府机关,薪资、待遇与职务直接挂钩,处于不同职能部门的不同位置,权利也自然大不同,小说《位置》单是题名已让人浮想联翩。肖仁福为小说后记直接取名“谋个好位置”,如何“谋”,有技巧、有机遇。对于主人公沈天涯和其政敌如何谋得预算处处长的位置,书中自然不乏描写,但显然《位置》不仅仅是这样一本官场厚黑学。《位置》一书围绕沈天涯起落沉浮于昌都市财政局预算处处长位置的故事展开。作者将主人公设置在“权与钱高度

密集”,位置特殊的预算处,目的十分明确——越是重要的权利部门越是能体现形形色色的机关人事。作者将“《位置》当作多棱镜和显微镜来观察社会”,从而“给读者提供一个可信的感知机关世情和社会现实人生的平台。”<sup>[1]387</sup>很明显,肖仁福不想让读者将沈天涯只是定位于一个预算处长上。沈天涯是作者熟悉的机关里的一个代表,也是社会转型期官场文人的代表,他的故事就是众多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命运呈现。沈天涯好不容易坐上预算处长之位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10-09-22

**作者简介:** 王 兰(1981-),女,山西太原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讲师,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后,还是从权利和金钱的争斗中败退下来。在斗争失败后,他并没有太强烈的失败感,作者为他设计了一个自我反省、自寻出路的结局。人虽然是凭借所处的“位置”来实现个人价值的,但肖仁福所指的这个“位置”显然并不是权利大小的官位,他试图用“形而下的世俗意义上的机关人事”来探讨更多形而上的问题。“位置”这一隐喻带领读者走入人性的多维和作者对当下官场的思考之中,我们试图从《位置》塑造的人物形象入手去揭开肖仁福所隐喻的世界。

## 一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萨义德定义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愿冒被烧死、放逐,他们是象征性的人物,其特征在于坚决远离现实的关注。”<sup>[2]</sup>他们保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以追求价值理想、终极意义为目标。而中国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则不同,“兼济天下”才是他们人生的最高追求,他们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这种价值取向经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国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以至于今天走进权力场仍是一些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空间的“官场”有着丰富的现实性,金钱、权利交织的利益网下,萨义德所谓的个人独立性或者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历史使命感都变成了一种奢望。混迹于官场的知识分子往往游走在理想与现实的两元之间,成为矛盾的综合体。

沈天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角色。沈天涯身上倾注着作者的理想,他有自己的做人底线,对钱、权并没有太多迷恋,内心中仍保留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义利观。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sup>[3]</sup>儒家肯定欲利是人之本性,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还是重利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在为政方略上,孔子提倡“因民之利而利之”。<sup>[4]</sup>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以礼义的道德法则统辖功利,强调行为的出发点和动机只能是礼义,而不是利益。寄还祝村长送的两千元,为楠木村修路送钱,沈天涯秉持着“义”节制了自己的欲望。对易水寒的朋友之义,对楠木村的为民之义,似乎在他身上仍能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意识和责任意识,他的心灵有皈依于传统士道精神的一面。

另一方面,沈天涯对楠木村的义举,源于妻子

“二舅”的养育之恩,如果不是这样的关系,沈天涯仍会关注楠木村的困难吗?沈天涯直白地告诉妻子“要不是因为你,我会为你二舅村里出这些力气么”。<sup>[1]50</sup>显然,沈天涯义举的出发点是熟人社会的人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这样描述我国社会长期的差序格局,“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sup>[5]</sup>重视“人伦”,即重视与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但这样来看沈天涯的义举不免大打折扣了。他并不是处处以圣人高尚情操来约束自己的士大夫,他的“义”更接近民间的“侠义”。与20世纪90年代《抉择》《人间正道》《苍天在上》等涉及官场的作品不同,沈天涯的形象并不是为了体现社会良心,或是用以表达对社会前途的希望。肖仁福没打算把沈天涯塑造成一个圣人,他只是一个世俗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小人物,“也走夜路,也要点小聪明”。东方集团的贿款,他不是不想收,只是怕担上不小的风险,加上读书人所受的教化,才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大笔的贿款他用之于民,小笔的好处却也收得坦然。

对纯粹的英雄,肖仁福是持有警惕的。他说:“我没有见过世上真有什么英雄,所谓的英雄都是有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粘贴在某一个人身上,或纯粹是虚拟出来的。”<sup>[1]389</sup>的确,在当代社会转型的环境下,那种在现实以外依靠神圣信仰建立的所谓理想价值体系,只能是一种虚妄。因此,沈天涯的定位,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士大夫,不是大公无私的道德楷模,他是肖仁福三味——“机关味、烟火味、人情味”的综合体。相对于高官,他有着平民的生活和心态,相对于一般民众他又处于精英地位;他无法履行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却仍恪守道义、良知,不愿堕落为纯粹的现实主义者;他身处政治权利之中,却希望保持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不愿沦为权力场的奴隶。因此,像沈天涯这样的官吏,注定在官场要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或是在权利斗争中败下阵来,或是自我主动远离权利争斗。他们的经历,可以说是特定政治文化的诠释。

## 二

沈天涯显然无力改变官场的沉疴,不能改变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的思路。沈天涯的前途在何方?肖仁福为他提供了两个思路:要么适应环境,沿着官场的路走下去,谷雨生是其样板;要么离开

官场,另谋出路,罗小扇已做了尝试。

作者借沈天涯故事的主线,引出了组织部一处处长谷雨生升迁的副线。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沈天涯、谷雨生两个人物各自的故事,慢慢交融为一个有关两个人的故事。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述,如果单写一个预算处长的故事,小说就该叫《预算处长的故事》或《财政局的故事》了,肖仁福展开的格局更大,想探讨的问题也更深入。“众所周知,一个地方有两大核心机构,一是组织部,管帽子的,是党委系统第一机关;一是财政局,管钱袋子的,是政府系统第一机关。”<sup>[1]386</sup>写了沈天涯和谷雨生就写尽了机关的全部。谷雨生比沈天涯更谙于官场之道,理想抱负也更大。从昌都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到昌永县的县委书记,谷雨生一步步稳健高升。处世上,他有较强的政治意识,有自己的做事原则,不会让自己身陷囹圄;为人上,他不轻易投靠谁也不得罪谁,程副书记可以说是他的靠山,但也是基于对其能力的赏识而给予提拔。他去到昌永县,改善交通运输,以市属牧场为突破口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造福了当地农民,也为自己积累了政治资本。既关注自己的政绩也关注地方民生的谷雨生,如果没有最后易水寒的事件,堪称完美的官员形象。但易水寒的事件恰恰成为谷雨生故事的点睛之笔。作者借沈天涯之口为谷雨生辩解道:“谷雨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客,他在易水寒身上做了一点小手脚,虽然可咒,但他仅仅把这当作一种手段,主要的出发点还是为了昌永的生态效益工程”。<sup>[1]384</sup>肖仁福深知机关里“不仅仅看能力,还要看能耐;不仅仅讲工作,还要讲操作”。<sup>[1]384</sup>谷雨生的工于心计并非满足自己对权利的追逐,它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方法。真实的政治空间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不按照这套游戏规则生存就只能出局,而想要在这个空间内如鱼得水,就必须顺应这套规则。所以,易水寒事件使得谷雨生的稳步高升有了说服力,谷雨生的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但对于沈天涯而言,继续为官就要像谷雨生这样才能自保和发展。作者为沈天涯设计这样的结局,说明肖仁福本身也并不认同谷雨生这样的自我价值实现,或者说并不认同这样的平台可以实现个人的价值。沈天涯逐步从权利的中心走向边缘也是肖仁福对官场文人宿命的判定。

《位置》中肖仁福将沈天涯的人生选择交予了书中几近完美的人物——罗小扇。她集美貌、智慧于一身,更重要的是她对沈天涯的纯粹的感情。她

对沈的感情是基于对沈的才华的钦赏和精神上的认同。她认为“一个人只要不做金钱和权利的奴隶,就少了奴性,多些骨气,值得女人去疼爱”<sup>[1]267</sup>,这份感情不带丝毫的功利成分。但罗小扇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她对社会非常了解,一次次给沈天涯提供了恰如其分的建议。也正因为了解,她才在官场保全了自己,并成功转型离开,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相较之下,沈天涯的妻子叶君山的贪婪、自私、势利则显露无疑,对权利、金钱的迷恋,使她难以成为沈天涯精神上的伴侣。罗小扇过于完美,使其整体形象变得不真实。就全篇而言,她更像是一个象征的存在,是沈天涯迷失自我时的引路人。罗小扇是沈天涯的“同志”,是他的精神支柱,更是他的精神导师,她率先跳出了体制,离开了机关圈子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罗小扇、沈天涯他们与中国传统士人最大的不同是其具备自我生存、发展的专业技能,罗小扇正是凭借这一特点得以华丽转身。沈天涯作为技术型的人才在预算处取得了一定地位,但若想有更大的发展,势必需要作出更多的妥协,这正是沈天涯当下的苦闷所在。小说的结局是一个开放结局,从政从商还是两难。沈天涯这样的人,想要在官场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实现人生价值很难,可是离开这个圈子他的位置又在哪里呢?他们虽然都是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高学历人才,但滥用的权利不需要精准的专业知识即可发挥作用。长期混迹于官场,沈天涯这样的才子所做的只是拼凑文件,“故意制造几个错别字”而已。专业荒废,圈养在机关的人已经失去了竞争的优势,更何况官本位、人情社会等现实环境下,离开未必就是真正跳脱出去。事实上,罗小扇的离开和成功进入商界,并没有太多说服力,不像作品中其他细节那么经得起推敲。罗小扇的契机是偶然的因素——丈夫的工作调动。对于罗小扇成功地进入商界,作者只草草一句“公司发展的不错”,作为交待,显得颇为荒诞。她是不是沈天涯可以效法的对象是值得怀疑的,但小说耐人寻味的将沈天涯的人生选择交给了罗小扇。肖仁福希望用完美的罗小扇来拯救彷徨的沈天涯,可是沈天涯试图从罗小扇那里得到的答案,相信作者自身也是不甚了了。

### 三

上至省长,下至司机,从权力人物到退休领导,肖仁福的小说涉及到机关的各个角落,原汁原味地向读者展示了机关浮世绘中每个人的生存状态。

肖仁福将自己的小说定位为机关小说,似乎有意与官场小说保持距离。当代官场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主旋律小说,其中的代表作有《人间正道》《抉择》《大雪无痕》《苍天在上》等。这类作品“对社会上的某些引起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焦点现象迅速的捕捉和报道,从而实现最大的传播效应”<sup>[6]</sup>;一类是以官场文化批判为主题的谴责小说,这类作品的创作者着力于展现当代官场中官员的生存现状,揭露权力压抑下的扭曲的人性,探究官场腐败背后深刻的现实与历史原因,其中以王跃文、阎真等为代表人物。从立意上看,肖仁福更接近第二类作家,但是对比一下《位置》中的沈天涯和王跃文代表作《国画》中的主人公朱怀镜、阎真代表作《沧浪之水》的主人公池大为,就会发现他们又有所不同。《国画》描绘的是主人公朱怀镜的升官图,其续集《梅次故事》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朱怀镜巧妙地化解了下级官员贿赂的同时,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对更高级官员的贿赂。王跃文一再强调“作家大可不必去抢政治家或思想家的饭碗”,给社会开药方,他是一个冷眼旁观者,他的工作就是官场文化批判。《沧浪之水》中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池大为,在受到现实生活的严峻挑战后,一次次对权力和腐败妥协,放弃了理想去抓取切身的现实利益。最初的池大为是一个彻底的具有传统士人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理想有其父的一脉相承,但在金钱与权利的交易中他逐渐放弃了自己最初的理想。小说中,作者阎真的激愤之情贯穿始终。冷眼批判或是激愤之情,王跃文、阎真在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情绪上的批判,源自于作品中主人公一步步向现实妥协,从知识分子立场走向了权利的中心。他们既有对官场现状的不满,也有对知识分子精神陷落的批判。相比之下,《位置》中则看不到肖仁福的批判或是褒扬,更多的是零距离的写实,以及通过主人公的思考体现出的作者对转型期官场体制的反思、对官场文人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此外,在情节设置上,与朱怀镜、池大为相反,沈天涯从权利的中心一步步走向了边缘。这种逃避式的消极态度上也可看到肖仁福对官场文人处境的同情。对于沈天涯们的生活肖仁福是有深刻体会的,他不会求全责备苛责于他们的选择,而只是力图还原现实生活的真相。肖仁福在沈天涯身上倾注了他对机关人的理解、同情和怜惜,因为他深知“机关人也太不容易了,要谋生存,谋发展,要

出人头地,都不是件轻松的事”<sup>[1]389</sup>。

肖仁福的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从起点爬到一定位置,结尾时又回到原点。与其说这是肖仁福的哲学思考,不如说是作者对当下官场生态研究后对身处权力场中知识分子们命运的无奈安排。肖仁福不是一个批判者,他是一个生活的还原者。他笔下言说的是“发生在我身边甚至是我身上的喜怒哀乐和世事人情”。“机关”或者说官场只是他还原世情,还原生活的一个着眼点,是作者熟悉的生活场景,并不是他发表自己观点的舞台。官场知识分子是他密切关注和试图呈现而不是他批判或是褒扬的对象。

严格来说,“官场知识分子”根本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任职于国家行政机构,对于担当重要职务的人何谈“独立”的立场?没有独立立场,当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可是,沈天涯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中国的传统情境之下,人们会自然将他归入“士人”一类。这个独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身上的“自我审视”机制,也是他精神困境的源头。这个机制会随时启动,使人维持在自己的原则即价值观许可范围内行事。但当这种原本非常难得的自我维持非但得不到鼓励,反而是不断地受到现实的挤压、冲击时,焦虑就产生了。很显然,沈天涯正是身处这重重焦虑之中。他的精神困境,除了逃避,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之下,恐怕没有什么开解之道。作者也只是为现实提供了高度写实的画像,没有在任何角落透露出希望将会出现的方向。他呈现的沈天涯式的困境,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政治层面的大困境的缩影。

#### 参考文献:

- [1] 肖仁福.位置[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
- [2] 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2.
- [3] 张 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611.
-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10.
- [5]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25.
- [6] 杨经建.“新闻化”:当前反腐小说的审美偏误[J].小说评论,2002(5).

责任编辑:黄声波